



反启蒙与 现代西方思想进程

Counter-Enlightenment and the Course
of Western Modern Thought

季广茂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反启蒙与 现代西方思想进程

Counter-Enlightenment and the Course
of Western Modern Thought

季广茂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启蒙与现代西方思想进程 / 季广茂著.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04-046352-1

I. ①反… II. ①季… III. ①哲学思想—研究—西方
国家—现代 IV. ①B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8178号

反启蒙与现代西方思想进程

Fanqimeng yu Xiantai Xifang Sixiang Jincheng

策划编辑 孙璐 责任编辑 孙璐 张岩 封面设计 李小璐 版式设计 李小璐
责任编辑 刘莉 责任印制 毛斯璐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4.75
字数 25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4.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46352-0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目 录

摘要	1
第一章 启蒙与反启蒙	5
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辨析	5
第二节 启蒙运动的基本性质	8
第三节 启蒙运动的主要成因	11
第四节 启蒙运动的主导倾向	15
第五节 反启蒙：两个相互关联的视角	36
第六节 反启蒙：历史的足迹	42
第七节 反启蒙：反人本和反理性	48
第八节 反启蒙：繁华落尽终有时	55
第九节 反启蒙：最后的反思	61
第二章 革命风暴与浪漫激情	69
第一节 卢梭：革命前的初试啼声	69
第二节 柏克：革命后的反省	79
第三节 迈斯特：激进反对派	85
第四节 哈曼：浪漫之源	92
第五节 柯勒律治：改写理性	99
第六节 夏多布里昂：重建基督教	105
第七节 尼采：以启蒙之道还治启蒙之身	111
第三章 极权阴影下的痛定思痛	121
第一节 极权主义：以墨索里尼等人为例	121
第二节 荣格：以非理性对非理性	128
第三节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被辩证的启蒙	133
第四节 塔尔蒙：极权与民主的联姻	139
第五节 伽达默尔：勇为偏见正名	144
第六节 伯林：对启蒙运动爱恨交加	158

第七节 巴塔耶：从祛魅到复魅	161
第八节 布朗肖：消解启蒙运动的观念	174
第九节 福柯：“古典时期”的掘墓人	180
第十节 德里达：颠覆存在主义	191
第十一节 克罗克等：反抗虚无主义	203
结语	216
主要参考文献	220
中文文献	220
外文文献	221
索引	224
人名索引	224
术语索引	225
后记	227

摘 要

本书旨在描述和分析西方反启蒙的思想历程。本书的基本预设是，西方现代思想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启蒙的历史；反启蒙并非一味地反抗启蒙运动，它还对启蒙运动进行反思，因而也是对启蒙运动的启蒙，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健康发展；“启蒙运动”是回溯性地建构起来的，是在启蒙运动的政治目标得以实现之后被追加的命名。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反启蒙，就没有启蒙运动。

本书分为三章。

第一章以“启蒙与反启蒙”为题，首先厘清某些重要概念，其次简要探讨启蒙运动的基本性质、主导倾向及哲学思想，再次简要勾勒反启蒙的思想历史和文化风貌。启蒙运动是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高度引人注目的历史时代，是一场高度自觉、诉求明确、席卷欧洲、波及全球的运动，是由一套扩散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特定观念促成的思想潮流，体现了特定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文化精神。启蒙运动推崇理性，主张怀疑，反对教权，解剖人性，推动进步，重视自然，珍视自由。反启蒙与启蒙运动相伴而生，但不同的反启蒙者攻击启蒙运动的不同方面，并提出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诉求。18世纪支持传统宗教的保守派攻击启蒙运动，说启蒙运动倡导的唯物主义和怀疑主义是邪恶的力量，直接导致了道德的堕落。浪漫派哲学家指责启蒙运动对理性的张扬使人过度依赖理性，忽略了历史、神话、信仰和传统具有的强大社会凝聚力。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指责启蒙运动追求适用于所有人的价值观念，他们主张文化多样化，反对道德上的一律。20世纪的反启蒙者指责启蒙运动冷酷无情、不讲道德，只是痴迷于技术统治，盲目追求人性的完美化，结果导致了极权主义的泛滥。虽然早就有人使用“反启蒙”一词，但确立了“反启蒙”在观念史上的地位的是以赛亚·伯林，他使人们意识到了作为一种思想潮流的反启蒙的存在。

一般而言，反启蒙通常是以理性为根基的，因而反启蒙也是启蒙的一种形式。尽管反启蒙者五花八门，立场迥异，并有悠久的历史，但他们不

乏共同之处：第一，所有的反启蒙者都会描述他们心目中的启蒙运动，都要涉及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和孔多塞等核心人物（特别是前面两位）；第二，指责启蒙运动具有欺骗性和危险性；第三，指责启蒙运动滥用理性。后结构主义与反启蒙的关系若隐若现，这主要表现在，后结构主义者自觉不自觉地依赖于反启蒙思想，以反启蒙的立论和观点为自身的理论背景。后结构主义的衰亡，意味着反启蒙的曲终人散。

第二章以“革命风暴与浪漫激情”为题，纵向梳理从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末的反启蒙的思想流变。卢梭最早批判启蒙运动，西方思想由此发生范式转型。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把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绑在了同一架战车上，使人相信两者之间必定存在着本质性的因果联系。如此一来，痛恨法国大革命必然痛恨启蒙运动，仇视雅各宾党人必然仇视启蒙哲人。笼罩在启蒙运动身上的阴影从此日益浓重，对启蒙运动的反抗更是风起云涌。埃德蒙·柏克认为，启蒙运动的哲学在法国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法国大革命成了“哲学式的革命”。启蒙运动的哲学误解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因而注定导致巨大的灾难。奥古斯丁·巴吕耶尔以阴谋论解释法国大革命，认为启蒙哲人、共济会和光明会联手策划了推翻法国政府与教会的活动。约瑟夫·德·迈斯特首先把法国大革命视为启蒙运动的结果，把启蒙哲人视为导致法国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上帝的“杰作”，但启蒙运动却是人的“杰作”，上帝要惩罚的就是人这一“杰作”：通过血腥的暴力，上帝在以其“看不见的手”对启蒙哲人做了严厉惩罚。尽管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极其恐怖血腥，但它伸张了正义，对法国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上帝惩罚法国人，是要拯救全人类，这和上帝牺牲耶稣拯救世人完全相同。迈斯特还提醒世人，理性无法与天启（revelation）抗衡，应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

革命的风暴过后，浪漫的激情降临。浪漫派并不直接反对启蒙运动，它首先凸显其局限，然后以新内容补充，最后证明启蒙哲人的主张存在缺陷。启蒙哲人只知理性、科学、进步和反教权，而不知美、精神性（spirituality）和宗教性（religiosity）。浪漫派无意维护法国的“旧政体”，但对启蒙哲人的“世界愿景”并不满意：那是一架冰冷的机器，没有人性，没有信仰，没有奥秘，因而无美可言。他们赞美中世纪，赞美前现代的基督王国，因为那时充满了精神性、宗教性和神秘性，因而是美的；他们期待的新时代，是宗教复兴、世界复魅的时代，因而也是美的时代。德国浪漫派的代表人物哈曼认为，德国启蒙者体现出来的知性主义（intellectualism）和对超凡脱俗的抽象理论的喜爱，使他们远离了深深

扎根于自然物质世界和历史的存在，忽略了“肉体知性”的存在。英国浪漫派的代表人物柯勒律治要恢复情感在精神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但又不把理性拒之门外，或使理性屈从于情感，而是通过重新界定理性，把情感置于理性的核心地带。他认为，理性有一种神奇的能力，不仅能够使人直接看见“看不见的现实”和“精神客体”，还能指导人的现实行为。夏多布里昂为宗教辩护，但他的辩护是对浪漫的辩护，也是对审美的辩护。他认为，宗教之美在于信仰本身具有精神性和神秘性，在于它蕴含着强大的直觉力量。

就反启蒙及其理念的激烈程度和深刻程度而言，无人能与尼采相提并论。他对启蒙运动的反抗，为反抗理性、进步、真理、道德和现代性提供了灵感和动力。他认为，西方过于重视和强调工具理性主义，重视理性必然忽视其他更为重要的人类机能，必然引发“知识肥大症”，必然使西方文化付出巨大代价。

第三章以“极权阴影下的痛定思痛”为题，纵向梳理 20 世纪的反启蒙思潮。和 19 世纪初的反启蒙者把法国大革命与启蒙运动直接联系起来一样，20 世纪的反启蒙者把极权主义与启蒙运动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启蒙运动是极权主义的肇因。这时，反抗启蒙运动，成了左翼和右翼共同的事业。墨索里尼是尼采的一大知音，也是启蒙运动的反对者。希特勒上台后，戈培尔声称，1789 年已从历史上一笔勾销。言下之意，启蒙运动已被剿灭。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走得更远，他越过了启蒙运动，直接进入了中世纪，把无意识视为人类精神的宝藏。马克斯·韦伯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是形式性的，后者是实体性的。在现代西方，工具理性一统天下。统治者从此可以在政治、社会、教育、宣传等方面，全方位地实施统治。这种统治是整体化和全能性的 (total)，统治者为所欲为，被统治者则被关进了“铁笼”，故称之为极权主义统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分析形形色色的启蒙形式，破天荒地把启蒙与神话绑在了一起，并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发现了西方启蒙最早的证据，其中的奥德修斯就是已获启蒙的人，也是以理性控制世界的现代人的原型。始于奥德修斯的西方启蒙在起步时充分肯定了个人的价值，但到了 20 世纪，个人终于遭到了启蒙运动的反噬，结果便是个人的销声匿迹。雅各布·塔尔蒙试图把“极权民主”与启蒙运动联系起来，探索“民主的独裁”的由来。在他看来，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冲突源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种认识论模式的针锋相对，因此当务之急是在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多元主义与极权主义、现实主义

与乌托邦主义之间保持平衡，不可偏废。

伽达默尔（又译加达默尔）对启蒙运动的反抗是通过阐释学完成的。启蒙运动认为真理的标准之一乃其客观性，把偏见归入“虚假意识”的范畴。伽达默尔对抗启蒙运动，把偏见视为我们的知识情境或“在世中在”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不仅为偏见正名，而且为权威辩护，反对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反对理性，必然反对知识，反对知识，必然反对真理，米歇尔·福柯是这方面的典范。在福柯那里，真理与权力唇齿相依，真理是权力的使者和幌子，比权力更阴险和危险，因为它以客观性为幌子，刻意掩饰自己的私利和偏见。真理如此，知识亦然，知识掩盖权力。福柯认为知识本身“恶毒”，求知的本能“凶残”，显示出极端反智主义的狰狞。巴塔耶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进步”内涵颇不以为然，对“主体性”“理性”和“自由”等概念更是不胜其烦，却对“为了暴力而暴力”或“为了战争而战争”大加赞美，要以疯癫、神话、异质性和超凡魅力等非理性力量对抗现代性具有的离心倾向。德里达是巴塔耶的精神后裔，几乎倾其一生致力于揭露“形而上学”与“暴力”的内在关系。他主张“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广泛涉猎政治和伦理问题，入侵“政治域”(the political)。他立足于海德格尔的反人本主义，认为人本主义在笛卡儿的“求意志的意志”(will to will)中登峰造极。20世纪的政治灾难，包括种族灭绝、极权主义、核战争和环境破坏，乃人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德里达要超越甚至颠覆萨特的存在主义，但真正笑到最后的，可能还是萨特。

第一章 启蒙与反启蒙

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辨析

对概念、术语或范畴进行严格、准确和清晰的界定，永远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因此，欲知“反启蒙”，须先知“启蒙”。欲知“启蒙”，须先把“启蒙”与“启蒙运动”这两个概念严格区分开来。

那么，何谓“启蒙”？何谓“启蒙运动”？“启蒙”和“启蒙运动”均为舶来品。与“启蒙”对应的英语单词是“enlightenment”，与“启蒙运动”对应的英语术语是“the Enlightenment”。“enlightenment”一词早在17世纪60年代即已出现。当时，它只是普通名词，而非专有名词，其字面意义指以光明取代黑暗的目标和过程，隐喻意义则指以智慧和洞识取代愚蠢和无知，并无后来的“启蒙运动”之意，故一般译为“启蒙”，而非“启蒙运动”。《现代汉语词典》给“启蒙”提供的定义是：(1)使初学者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2)普及新知识，使摆脱愚昧和迷信。^①英语中的“the Enlightenment”最初是从德语中的“Aufklärung”翻译而来，主要指18世纪的法国哲学，特别是启蒙哲人的哲学。与普通名词“enlightenment”不同，专有名词“the Enlightenment”一般首先指西方18世纪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整个18世纪。在这个时期或世纪，理性和感觉经验被视为知识的来源，现代科学被视为人类进步的阶梯，宗教宽容被视为社会进步的标杆。职是之故，“the Enlightenment”一般译为“启蒙运动”。^②《现代汉语词典》对“启蒙运动”的定义是：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版，第1022页。

② 把“the Enlightenment”译为“启蒙运动”，还是有些不尽如人意，因为“the Enlightenment”除了指“运动”，还指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文化精神。但天长日久，约定俗成，要改也难，不如沿用旧译，只是需要注意“the Enlightenment”的内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避免仅仅把它理解为“运动”。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词，也是如此。

(1) 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启发人们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自由、个性发展等。(2) 泛指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的运动。^①同样，“counter-enlightenment”指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启蒙”(普通名词)，即“反启蒙”；“the counter-Enlightenment”指反对特有的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专有名词)，即“反启蒙运动”。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其间的混乱和差异。国人尤其如此，与此有关的译文更是乱象丛生。格雷姆·加勒德(Graeme Garrard)对这些概念做了颇为透彻的辨析。他发现，即使在崇尚“分析哲学”的英语世界里，有关“enlightenment”的用法也是混乱不堪：“enlightenment”“Enlightenment”“the enlightenment”和“the Enlightenment”四种用法并存，令人眼花缭乱。不仅不同的人用法不一，同一个人在同一篇文章甚至同一句话中，其用法也不尽相同。^②略微了解英语的人都知道，“Enlightenment”和“the enlightenment”表意含混，令人不知所云。只有“enlightenment”和“the Enlightenment”才有确定的内涵。法国18世纪的启蒙哲人(*philosophes*)从未使用过首字母大写且加定冠词的“启蒙运动”意义上的“启蒙”，只使用首字母小写且无定冠词的“启蒙”(*éclaircissement*)。他们有时也自称“启蒙之人”(*les hommes d'éclaircissement*)，究其含义，也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无关。只是到了18世纪末，法语中才出现了短语“光明的世纪”(*le siècle des Lumières*)。“光明”(*Lumières*)在法语中的真正流行，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其含义与英语中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相当。但即使到了今天，法语中也没有与“the Enlightenment”相对应的“*l'Éclaircissement*”。英语中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一词出现较晚。在“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一词出现之前，西方人一直用“理性的世纪”(the age of Reason)指称启蒙运动时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所改观，“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彻底取代了“理性的世纪”的用法。

国人更没有将“启蒙”和“启蒙运动”严格加以区分，或者说没有想到将两者区分开来。说到“启蒙”，康德1784年在《答“何谓启蒙？”》(“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一文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版，第1022页。

^② 参见Graeme Garrard, *Counter-Enlightenments: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6–7。

中为“启蒙”提供了一个定义。他认为，“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愿接受的不成熟”，而所谓的“不成熟”就是“倘若没有他人指引，无法运用自己的知性”。^① 启蒙是一个自行思考（think for themselves）的过程，是运用、依赖知性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决定自己相信什么、采取何种行动的过程。何兆武把此文标题译为《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把该文的第一句话译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② 通读全文不难发现，康德所论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启蒙”（普通名词），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专有名词）并无直接关系。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他嘴上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但心里想的是“启蒙运动”，就像后来的尼采和福柯一样。但即便如此，直接把“启蒙”译为“启蒙运动”，也是不够严格和确切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启蒙”（enlightenment）和“反启蒙”（counter-enlightenment），而是18世纪特有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和随之出现的“反启蒙运动”（the counter-Enlightenment）。因为没有把一般意义上的“启蒙”和“反启蒙”与18世纪特有的“启蒙运动”和随之出现的“反启蒙运动”区分开来，我国学术界一般把“enlightenment”和“the Enlightenment”译为“启蒙”，把“counter-enlightenment”和“the counter-Enlightenment”译为“反启蒙”。为了照顾这一既定的学术传统，本书使用“反启蒙”一词，而不使用“反启蒙运动”一词。除非做出特别的说明，这里的“反启蒙”专指“反启蒙运动”。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某些西方思想家嘴里说的是“反启蒙”（counter-enlightenment），心里想着的却是“反启蒙运动”（the counter-Enlightenment）。使用“反启蒙”一词，能够较为方便地探讨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至少不会遗漏这些思想家的思想，避免酿成“遗珠之憾”。

^① Immanuel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ed. Hans Rei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54. “Enlightenment is man’s emergence from his self-incurred immaturity. Immaturity is the inability to use one’s own understanding without the guidance of another. This immaturity is self-incurred if its cause is not lack of understanding, but lack of resolution and courage to use it without the guidance of another.” 此文中译版本甚多，但均不太令人满意。原因之一，是对“enlightenment”和“the Enlightenment”的理解较为混乱。

^②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页。

第二节 启蒙运动的基本性质

“启蒙运动”一词的使用甚是混乱，因为不同的人常常赋予它不同的内涵。在很多人看来，它是“现代性”之源：既派生了自由主义的宪法，又导致了使人异化的技术。可见“现代性”本身就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的内涵。虽然如此，时至今日，还有形形色色的团体和政党打着“启蒙运动”的旗号招摇过市，为自己的行为或政策辩解。2005年，丹麦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幅颇具挑衅性的漫画，此举不仅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而且引发了骚乱。反对发表这幅漫画的人声称，它违背了启蒙运动倡导的价值观——容忍“他者”和“差异”，尊重少数族裔。拥护发表这幅漫画的人声称，反对者的做法违背了启蒙运动倡导的基本理念：人人都有新闻自由和自我表达的权利。如此说来，究竟有几个启蒙运动？为什么它倡导的理念如此自相矛盾？最重要的是，何谓“启蒙运动”？它是一个历史阶段，一场知识运动，还是一个思想潮流，一种文化精神，一套价值观念，甚至一个心理框架，一套文化成就？面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会勾勒出它的不同方面。就一般人达到的基本“共识”而言，启蒙运动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样，启蒙运动首先是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高度引人注目的历史时期。这样的历史时期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在这个时期，科学、哲学、社会和政治均发生了天翻地覆之变，中世纪的世界观被一扫而光，现代西方世界终于降临。启蒙运动在法国大革命时达到顶峰。那时，传统上等级森严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君主制、贵族特权、天主教权威）等一切根深蒂固的确定性（certainties）均被彻底动摇，崭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逐渐形成。英语世界称之为“理性的世纪”、“探索的世纪”（the age of exploration），德语世界称之为“批判的世纪”（Zeitalter der Kritik），法语世界称之为“光明的世纪”（*l'âge de Lumière*）、“哲学的世纪”（*l'âge philosophique*）、“人的世纪”（*le siècle de l'humanité*）和“仁慈的世纪”（*le siècle de la bienfaisance*）。总之，启蒙运动的出现意味着现代性的诞生。

一般认为，启蒙运动出现的时间大致是整个18世纪，但具体而言，又有几种不同的说法：(1) 1668—1776年，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止于美国宣告独立，共108年；(2) 1668—1789年，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止于法国大革命，共121年；(3) 1668—1815年，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止于拿破仑战争结束，法军战败，拿破仑再次

退位并被流放，同时也是浪漫派崛起之时，共 147 年；(4) 1668—1900 年，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中经马克思，止于尼采辞世，共 232 年。某些历史学家把 18 世纪视为现代史的肇始。依据这种看法，文艺复兴强调的个人主义，宗教改革重视的宽容忍让，美洲新大陆及东方的发现，17 世纪的科技进步，统统只是启蒙运动的“预演”或“前奏”，全都没有导致重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变革，故无法与启蒙运动相提并论。只是到了 18 世纪，才真正出现了重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变革。启蒙运动的非凡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启蒙运动是一场高度自觉、诉求明确、席卷欧洲、波及全球的“运动”。我们把“the Enlightenment”译为“启蒙运动”就是强调它的这一维度。启蒙运动之所以被称为“运动”，是因为它给基本处于静止状态的欧洲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之由“静”而“动”。如前所述，启蒙运动产生的冲击力，是以前的思想运动（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所远远不及的。以前的思想运动要么只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文艺和宗教），要么只影响了某些人的生活（艺术家和宗教信徒），而启蒙运动则使整个人类社会发生了惊天逆转。

国人多强调启蒙运动是文化运动（cultural movement），西方人多强调启蒙运动是知识运动（intellectual movement）。如此一来，依西方人之见，理解启蒙运动就是理解启蒙运动的知识史。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认为，启蒙运动“只是构成了整个知识发展的一部分或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哲学思想获得了特有的自信和自觉，……在理解自身的性质和命运方面，在理解自身的基本特性和使命方面，都变得明晰和深刻”^①。在卡西勒看来，启蒙运动的知识首先是有关人的知识，人的知识的终极目的，在于推动“人类心灵的历史进

^①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tr. F. C. A. Koellen & J. P. Pettegrove, p.vi. “It forms but a part and a special phase of that whol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hrough which modern philosophic thought gained its characteristic self-confidence and self-consciousness...achieves clarity and depth in its understanding of its own nature and destiny, and of its own fundamental character and mission.” 参见中文版：“它只不过是整个思想发展的一部分，是近代哲学思想在形成其特有的自信和自我意识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个特殊阶段。……对自己性质和命运、基本特征和使命的理解，何以这么清楚，这么深刻。”——〔德〕恩斯特·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2 页。说明：由于版本不同（或其他原因），本书译文与常见中文版的译文存在些许差异，这实属正常现象。把常见中文版的译文引在这里，目的在于帮助读者理解原文的含义和精神，同时向译者表示敬意。此后的此类注释与此相同，不再一一说明，望读者体察。

化”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human being)。这样的知识又称“人学” (science of man)。建立人学的目的，在于证明存在着普遍的人类一致性 (universal human identity)。此论为后来的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所诟病。

第三，启蒙运动是由一套扩散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特定观念促成的思想潮流。这些观念叠彩纷呈。启蒙运动就是由这些观念组成的混合物。尽管如此，启蒙运动有其自身的概念、方法、价值观念和改造社会的方案。就其观念而论，它基本上是一套社会哲学 (social philosophy)，始于改造社会的理想，终于改造社会的目标，同时把宗教和艺术纳入改造社会的范围。总之，凡事以改造社会论之。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它对人性与社会有其基本假定。它研究支配自然和社会的法则，并为改造社会奠定了方法论根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改造社会的方针大计。

启蒙运动的观念绝非铁板一块，它范围广泛，形态万千。它既有旧观念的延续，又有新观念的创生；既有古典主义的情怀，又有浪漫主义的激情；既有一味求新的“唯新主义”，又有乡愁浓郁的“原始主义”。但启蒙运动影响深远，其观念、理想、渴望、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议，在西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余，在中国经历了数次“救亡”之后，至今绵延不绝，甚至高入云天。

第四，启蒙运动体现了特定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文化精神。启蒙运动重视理性，启蒙哲人被称为“理性党” (Party of Reason)。启蒙哲人相信人类的能力 (abilities) 和能量 (capacities)，而人类的能力和能量源于其知性力量 (intellectual powers)。笼统说来，这些东西归在一起，被人以“理性”名之。借助于理性，人类能够获得有关自然的系统知识，并把这种知识作为实际生活的权威指南。有了理性，人类就有了理解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人类要想自我保存和延续生命，这种能力必不可少。权威是盲目的，因而是非理性的，启蒙运动当然与之不共戴天。在这个问题上，启蒙运动思想家是“一元论者”，绝对不讲什么“多元”，更不会宽容：他们相信人类的能力、能量、智力和知识，并以之为权威，同时对其他形式的权威（如传统、迷信、成见、神话和奇迹等）不仅深表怀疑，而且嗤之以鼻，甚至充满敌意。他们用理性的权威反抗这些形式的权威。正因为如此，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往往与官方宗教 (established religion) 势不两立，因为两者的主张针锋相对。在康德看来，人一旦摆脱了自愿接受的不成熟状态，一旦敢于独立思考，敢于运用自己的智力，在思考和行动时自我指引，那官方宗教就会成为“多余”，就会被弃之如敝屣。如果在这

个过程中遭到宗教的反对，自然可能结为仇寇。启蒙哲人相信，人一旦获得启蒙，最终会改善自己的存在状况。理性既是教条、迷信、虚假的社会权威的克星，也是它们的解毒剂。

第三节 启蒙运动的主要成因

启蒙运动是由法国 18 世纪中叶的启蒙哲人直接倡导的。启蒙哲人的核心则是当时的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派的核心成员包括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孟德斯鸠等人。如此说来，启蒙哲人是一个非正式的松散文人组织，他们本来身处五湖四海，却为一个共同的目标——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所谓的“启蒙运动工程”（project of Enlightenment）^①——走到了一起。他们虽然是一个非正式的松散文人组织，却不再像以前那样呈现散兵游勇之态。拜咖啡馆（英国）和沙龙（法国）之赐，他们有了自己的“公共空间”或“公共域”。他们的“成果”也引人注目。《百科全书》的主要作者是科学家、建筑师和艺术家。此前出版的百科全书，特别是路易·莫雷利（Louis Moreri）的《大历史辞典》（*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主要致力于传统条目的编撰，这些条目涉及传记、宗谱、神话、神学、军事、地理和历史等。对路易·莫雷利颇不以为然的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独出心裁，另起炉灶，于 1695—1697 年间编纂《历史性和批判性的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但最终未能跳出窠臼，打破既定的传统。相形之下，《百科全书》除了众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条目，以及形形色色的手工艺品（handicrafts）条目，还增加了有关“人”（man）、“社会”（society）和“方法”（method）等的条目。此外，它的内容更加系统，解析更加透彻，写法在当时更具先锋意味，后世读者完全可以从中学到启蒙运动的风貌。^②

启蒙运动是一场旨在推进社会变革的“圣像破坏运动”（iconoclastic movement），它要打破旧观念、旧方法、旧习惯和旧权威。据达朗贝尔为

^① 参见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p.62。

^②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乏善可陈，没有发挥值得大书特书的作用，甚至寸功未立。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廉价的旨在供人消遣的文学，以满足当时业已扩大的阅读公众的需求，并因此形成了流行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行为，但这一切都没有与旧传统构成冲突，也是在旧传统中形成和运作的，且缺乏创意，故而对观念的嬗变并无推动之功，略去不提，可也。